

目 录

杨森溃经遂宁目击记.....	陈俊昌 (1)
老池樊松山剿匪亲历记.....	夏怀安 (2)
遂宁县百年来田赋演变概况.....	胡光翰 (4)
遂宁成立最早的供销合作社——拦江供销合作社.....	喻玄华 (7)
遂宁华美油行见闻.....	李国梁 (10)
大安小学简史.....	田旻若 (11)
天主教传入遂宁的前前后后.....	刘伯常 (12)
从黑暗走向光明 (续四)	赵洪轩 (14)

杨森溃经遂宁目击记

西眉 陈俊昌

重庆卫戍区警备司令部，总司令杨森，号子惠，一九四九年冬溃逃经遂宁时间，各说不一，我对此事记忆难忘。

当时，本人奉命在安平乡至安岳所属之通贤乡一段公路处，解决路面坑洼，车辆难行，粮运不易之事。到后遂征召义务劳动整修，便利粮运。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晨，早饭后，正欲起身赴工地，县府突然来电叫我回县，未说什么事，只说“回县一见了然。”我即起身回县，行至安居乡雇乘长途滑竿，经聚贤时，眼见由县城内外出的男女老少，扶老携幼，背包负袋络绎不绝，形同逃难。又兼天雨，路滑难行。到达遂宁城西，德胜街布置了警戒维持秩序，有相识者互为招呼。到达遂宁县府本人住地，只见室内空空，铺具等物也全部搬出。女工曾嫂闻听本人回来，即回县府煮晚饭，用完晚饭同事六、七人休息谈话。后出街一瞥，县府大堂空坝两旁挨次排列汽车有四十余辆，大北街至中山路，北门裕丰街及其他大街挨次排列汽车难计其数，其中有几车的人未下车休息，遍城关门闭户，未能营业。至十六点正，杨森偕同夫人及范参谋长乘吉普车到达遂宁。休息片刻后已是二十点正，即到专员公署，利用长途电台接通成都励志社，向阎锡山（行政院长）报告到达遂宁情况，并称遂宁有夏总指挥负责，请院长明晨派飞机将潼南太安镇大桥炸断，阻止共军追击。报毕到遂宁县府用晚餐（专员署长途台距县府只隔一围墙，我的宿舍距围墙不过丈余听得清楚）。

十二月三日早饭后，杨森会同参谋长、警卫长、县长陈伯良等全城巡视，回到县府写了条告称：敢有估吃霸踞者杀。于全城张贴，并赅即派部队巡查督促各店铺开门营业，巡查至东门外老飞机场有一士兵，将城内商民疏散洋纱抢夺去一并，被巡查队看见，立即处死。经审讯系师管区补充团的士兵，回报杨森，又下令叫师管区司令来，师管区司令周某早已疏散在仁里乡，警卫奉命飞奔拿回候令定夺。杨森曰：你是周司令，你在哪里去了？答曰：小职疏散仁里乡。杨森曰：谁叫你疏散，我打电话给阎院长，枪毙你！吓得周潜川浑身是汗，魂飞天外，不由自主。派兵押着候令。霎时间消息传出，全城照常营业。杨森这样做是，用以安定人心，企图稳住残局。

十二月四日陈伯良请求，称：遂宁县乡村电话管理所，电话员工，轮流值班昼夜不断，消息灵通，请求杨总司令奖赏尽职员工。杨森闻报有理，下令乡村电话员工未误军机，各奖赏大米壹市石，由乡村电话管理所核实名额，即向粮食仓库具领转发。

十二月五日晨，杨森随着大军向绵阳逃窜，并给陈伯良一辆汽车，陈伯良乘车去成都。我于是日十时许，即将棉被床毯打成背包回家。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日

老池乡樊松山剿匪亲历记

西眉 夏怀安

老池乡位于涪江河岸，离县城四十华里，是遂蓬潼三县毗邻之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获得解放。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热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但是地方上的反动势力舒子民等还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继续压迫人民。他们趁县区人民政府刚刚成立，乡保尚未改组之际，勾结各乡的土匪和伪自卫队队长、反共游击队头目袁秉衡结成团伙，号称“九路军”，抢劫人民财产，扰乱社会治安，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严重的威胁。

老池乡公所原有步枪十八支、手枪六支、小快枪二支，这是用来维持地方治安的，舒子民等匪徒，为扩充势力，阴谋策划抢劫这些枪支，他们支使匪徒代云五来串通乡公所的队丁枪夺武器，我当时是该乡乡长，听到这消息，就同警察队长余安民秘密商讨，决定把枪支先送到区上。老池距西眉区有三十余里，都是小路，白天是不敢走的，怕中途被匪枪夺，我遂于十一月五日晚上向队丁宣布：今晚全部到区上开会，宣布后由警察队长余安民率领全部队丁携带枪支弹药向区上进发，第二天，刚天明的时候达到西眉，我向区长说明了情况，把枪支弹药造册登记，全部如数交给区上，同时宣布把队丁解散，各自回家，因此乡公所的枪支弹药得以安全送交区上，匪徒的透劫枪支弹药的奸计未能得逞。

一九五〇年二月某日县上派来四名解放军、四匹马到乡工作。刚到乡公所半小时之久，就被匪徒发现，霎时，就把我乡公所包围得如同铁桶一般，并紧缩包围，匪徒亮出手枪、短枪妄想击毙我和四名解放军，抢夺枪支。当时我想由后门带解放军奔向后山南家寨。待我把后门轻轻打开一缝窥视，见后门满布的匪徒，机械地走来走去，到处观望，实已无路可走。看到这种情况，我吓得六神无主，解放军同志具有英雄气概，准备冲出去与敌人硬拼，感动了我，我也比先前镇定许多，我想：敌人势众，我们寡不敌众，奈何他们不得，我们该怎么办呢？突然急中生智，在这性命攸关的紧急时刻，想起原先看《三国演义》时读过孔明巧用空城计骇退司马懿大军的故事，我想大敌当前何不用一用，看行不行，好在我们的电话机下面就是一个茶馆，名叫萧韶乐社，随时打电话，茶馆内可以听得到。这时茶馆内挤满了匪徒，于是我马上把电话机摇动对着电话机故意大声说道：“喂！哪里？……区上啊？……怎么？来了两个连的解放军。啊！什么时候出发的？嗯，快到了？啊，好、我去准备一下”我放下耳筒，心想匪徒一定听到了，我急忙喊留下的通讯队陈洲如上街打锣，叫大家打扫街道清洁，烧开水迎接解放军，解放军就快到了，无柴的到乡公所戏楼下面去搬柴，（那时收的柴草堆在此地）陈洲如急忙提起锣出乡公所门就咣咣打起，全街的人民群众是热爱共产党、热爱解放军的，听说解放快到了，大家都欢天喜地、忙碌起来，有的拿着扫把争先恐后去打扫街道，有的忙着抱柴烧开水，川流不息一片沸腾景象，匪徒们本来就又惊又惧，听到解放军要到了，又看到广大人民群众都在热情地准备接待解放军，他们更断定刚到乡的四名

解放军是先遣队，更是吓破了胆，急急忙忙地撤除包围，灰溜溜地四处逃跑，逃到前面的和场上的匪徒就向沙坝由肖家渡过河。我闻匪徒慌忙地撤退了，还怕敌人怀疑反复，又转来，就一面命一保保长王壁溪火速找地点为解放军同志煮饭，在坝下买点小菜，一面乘匪退走之机迅速带四名解放军同志快马加鞭，奔出野外，正走在沙坝之中，突然发现还有部份匪徒未过河，在河边东张西望，我们就抛弃大路，改道小路走，那时土内庄稼茂盛可以遮掩我们的身影，我们就弯腰疾行。走了许久，等到登上唐家大坡已是气喘呼呼、汗流满面。我们在隐蔽的地方暂休了少许，继续赶程，穿过龙凤之后，悬着的心才放下去。等到解放军安全脱险、平安回到县城，我已不敢回乡了，只好转道回到区上，并把上述的情况报告给区上了。于此，匪徒就想暗害于我，他们支使米心乡的土匪肖南平和老池乡十一保（现为三新乡六大队）土匪地主滕伯光来暗杀我，因为我不在家，四次暗杀未遂，后来将滕伯光逮捕归案。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日以袁炳衡为首组成的九路军匪徒约千余人登上了樊松山扎下大营，妄图负隅顽抗，山上围满几里的石头寨墙，有四个寨门寨内甚宽，有良田二百余挑，有十分高大华丽的庙宇两座，此山离老池乡约三十华里，传说汉代樊松将军在此山屯过兵，占山为王，还有将军坟等。匪徒妄想以此为据点，进行暴乱，反动气焰甚是嚣张。就是老池的逢场期，许多匪徒还来街骚扰，在街串来串去，惹事生非。在这样情况下，我早已不敢露面，每天到处躲藏。一天，我刚走到场外桥边，就碰着樊松山下面的农民罗春祥，戴着斗笠身穿一件破烂布衫样子看来十分紧张，一看到我就伸手把我拉到无人之处，说是紧急情况告诉我。罗说道，我特来向你报告匪情，昨晚大批的匪徒，由庙基子过河，登上了樊松山，匪徒自称是袁炳衡、舒子民的队伍，这都是九路军的队伍，还不准任何人走漏消息。我听到这情况，吓得目瞪口呆，汗下如雨，不知所措。我想怎样才能把这件事情向上级汇报呢？又不敢上街，这时我灵机一动，马上叫我的儿子（名吉娃）年上10岁，我叫他用个背篋放了几窝牛皮菜，由后门到乡公所，叫留在乡公所的文书夏吉光把电话机撤下，放在背篋内再在上面用牛皮菜盖上，外人看来象是背了一背牛皮菜。这样他终于把电话机背出了乡公所，我又对罗说，不要回家，另找个地方居住，我马上把电话机背到离场两华里外的半坡上的豌豆土内隐蔽起来，用铁丝从电杆线上牵下来，接上电话机，把地线插在土内，由于土内干燥，接上线后不能通电，附近又找不到水，我就屙下小便，把土浸湿才终于把电话接通了，于是我将情况向姚区长报告了，由于情况紧张，姚区长就叫我马上赶到区上接受任务。我赶紧把电话机埋进豌豆土内，并在上面打上暗记，从小道迅速跑到区上。区上已经戒严了，作好了迎敌的准备。姚区长正在同部队研究剿匪计划。当天晚上两点左右，部队从区上出发了，姚区长命令我给部队带路，去攻打樊松山。同时又给我布置了另外一个任务，就是战斗打响后，叫我离开阵地，向区上报告战斗情况。我们赶到樊松山麓的时候，天刚破晓，战士们未吃早饭，怎么办呢？只好把部队开到三关庙（现三新乡）住到，隐蔽起来，在杜松林家里借两斗米，战士们埋锅煮饭。战士们很快吃了早饭，接着直奔樊松山看了地形，研究决定由何门攻入此山最高峰，可是附近的山都矮，只有尖峰山稍高一点，此山对面是樊松山的东门，只好决定从东门攻入寨内，就得两挺机枪架在尖峰山上，掩护战士们进攻。首先第一队由张排长带了一班人。这班人全是手枪手，从尖峰山脚下跨过一条小溪，冲上山去，他们刚冲到半山腰，被寨内巡哨的土匪发觉，赶快把寨门闭上了，战士们连忙开枪射击，山上的机枪也吼了起来。但是，由于两山相隔距离太远了，机枪子弹只能射到寨外面不能给敌人以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英勇的人民战士冒着枪淋弹雨，攻到了寨门边，由于寨门已紧闭，寨墙又很厚，

土匪配有严密的火力，无法攻进寨去。情况万分紧急，每一分钟，战士们都担着无数风险。机枪还是拼命射击。我必须把情况立即告诉上级，这是我的任务。此地又无电话，怎么办？怎么办？我心急如焚，最后我终于想到埋在豌豆土内的电话机，我赶忙如飞一样，离开阵地，赶到我埋电话机的地方，把电话机取出来接好电话线。电话打通了，我立即把战斗情况，向区上作了汇报，姚区长接到电话，对我说，他们已经听到机枪声了，喊我不要再到阵地上去了，县上已派一个连来增援，并叫我等部队一到就马上把部队带到阵地上去。电话说完了，我依然把电话机藏好，转到王家场坡看县上的部队来没有，一路上看见老池乡公所后山南宁寨内有土匪观望，还看到上街去的农民买东西的惊慌转回，土匪在田家渡抢船上的饼，等了一会时间，县上的解放军未来，战斗一直坚持到午后五点钟才结束。炮声停了，机枪也哑了，我们的部队撤走了，回到了区上。到十二点钟左右，县上派来了一个连，还带来了一挺八二大炮，决定第二天拂晓用大炮轰击寨内。当晚区上的工作人员和部队全部撤到区公所后山碉堡内住宿。第二天一早，部队出发了，刚走了四五华里，派去的侦察兵，赶回来报告说：匪徒已于半夜弃寨而逃。匪徒们虽然当天逃脱了应得的惩罚，但人民政府的政策宣传，很快深入人心，群众纷纷检举揭发，被欺骗胁迫而参加“九路军”的一般人员，也纷纷向政府坦白交待，登记自新，袁炳衡等匪首，不久便被追捕归案，受到依法严惩。

遂宁县近百年来田赋演变概况

南强 胡光翰

遂宁县（现为遂宁市市中区）地处四川中部浅丘地带，自然条件良好，物产丰富。清末至民国，由于赋税繁重，灾祸频仍，广大劳动人民无年不在饥饿困苦之中挣扎，新中国建立后，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解放了生产力，粮食产量逐年递增。农业税（旧称田赋或简称粮）的征收长期贯彻“公平合理、增产不增税”的精神，对粮食的分配、管理，从建国之日起，完全由国家统筹安排，不但保证了军需民食，且使各项建设都得以顺利进行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落实农业经济政策，粮食大幅度增长，农业税仍稳定在六十年代配额水平。简扼回顾一下，近百年来田赋的征收和粮食产销的演变，对于当代特别是下一代人是有教育意义的。

一、田赋——农业税

田赋为历代政府财政收入之大宗。征收办法：主要按田土面积与粮食产量厘定赋额及税率，由土地所有人照章完纳。清代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均按赋额折收钱币。民国三十年（1941）因法币贬值，遂改征粮食。1950年人民政府为适应“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需要，农业税仍征粮食。

清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多次订立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国库空虚，1850年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清廷大募兵勇，力图镇压，兵多饷匮粮乏，除加紧征收每田赋额一两（按地折合的计税单位）完银一两外，相继按赋额加派“津贴”，“捐输”等附税，仅此两项税共收银八万余两，故清时赋额一两完银五两有余，当时全县赋额20115两而实税收白银10万余两。

1912年民国建立，根据清代版册，改正粮为正税，津捐为副税，是年遂宁划出下三里成立潼南县，分去正粮5710.96两，本县实有赋额14404.106两。当时田赋每两各征银1.6元，又按实征银数每十成加征一成，稍后迭经加收，每两征银10元，地方附加钱3000文。民国九年（1920）川中战事迭起，川军吕超、刘存厚、杨森等和北洋军汤自沐、滇黔军顾品珍先后驻扎遂宁。此去彼来，就地征派粮款，遂开田赋紊乱之渐。防区制兴，军阀连年混战，田赋则任驻军长官恣意征收，县长、征收局长以及团保之流，更变本加厉，巧立名目，滥派浮收，甚至一月征一年之粮或一年预征数年之赋；如民国九年滇黔联军顾品珍驻遂一月，勒派粮饷70余万元。民国十五年（1926）边防军李家钰驻遂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预征田赋竟到民国五十二年（1963）。民国二十四年（1935）川政统一，除正粮每两征收法币10元外，借（剿匪）、“抗日”等名义附加征收率占正粮35%，民国二十六年（1937）占95%，民国二十八年（1939）占125%，民国三十年（1941）则占530%。

民国三十年下年，田赋改征粮食，每正粮1两征收稻谷11石，同时价购稻谷11石（每石108斤），每购谷1石发30%现金，70%粮食库券，是年全县征谷158,751石，购谷142,166石，合计征购300,917石。民国三十二年（1943）经过土地陈报，实行新科则，以元为计算单位，全县共有赋额133,728元，是年共征稻谷183,327石，借谷（改购为借）145,493石，合计征借稻谷328,820石，随粮附征的有省、县级公粮、积谷、马路粮、教师补助谷等；附征稻谷数目约占正粮80%。在征收管理方面，当时甚为流行“从政不如从粮，从粮不如当仓”的谚语。（旧称妓女为娼妇，“仓”与娼谐音、“粮”与妓女改嫁从良的良字谐音）。民国三十二年田管处长田丰玉两年擅行超收稻谷18,800石，控告书如雪片飞来，名撤职竟潜逃了事。民国三十七年（1948）田粮处长洪寿窃卷巨款十余亿元逃走，经保安队挡获拘讯，却悄然以不了了之。当“权”者如此，当“仓”者更不用说了。

1950年2月遂宁县人民政府为了保证供给，稳定粮价，促进工农业生产，开始征收1949年公粮，川北人民行政公署核定征收稻谷43,491,954斤，颁发贯彻合理负担，按旧田赋调整加成办法，每人年收入稻谷不过200斤者免征，确系贫困者减免，为方便交纳，持有金、银、纱、布等物均可折价征收。1950年8月依率计征本年公粮46,390,000斤（原粮下同），实行《按田分等，分等定产，按人平通产多少，累进计税》的计征办法。由于负担合理，年征一次，严禁额外摊派，各乡分配任务均如数完成。1951年遂宁完成土地改革工作，行署颁发《农业税税率表》，按田计产，是年公粮计征45,410,000斤，1953年遵照中央指示，实行“按田按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政策，征收税额47,330,000斤，以后三年不增加。1958年8月，四川省人民委员会颁发《四川省农业税征收办法的命令》，规定所属地区税率提高不得超过常年产量25%，是年征收农业税52,040,000斤。1961年鉴于“大跃进”时期工作失误和自然灾害损失严重，是年农业税减为29,881,600斤，1962年为32,899,488斤，1965年以后，农业税常年稳定在35,000,000斤左右。1979年因旱灾减为8,870,000斤，1981年因洪灾减为23,030,000斤，粮食产量最高的1984年农业税仍保持常年基数32,130,000斤未

增加。从县财政总收入看：1950年农业税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61.28%，1970年为33.36%，1984年已下降为11.9%。

二、粮 食

遂宁县境内1949年有耕地117万亩，人平1.75亩。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占总产43%，次为小麦、红苕、豆类、高粱、玉米，经济作物以棉花、油菜为主，次为花生、芝麻、甘蔗、药材等；清代至民国，大部份耕地被少数官僚、地主所占有，重租厚押，残酷剥削，加以赋役繁重，水利失修，肥料缺乏，种子、农具窳劣，以致粮食亩产只200余斤，农民终年劳动所得，除交租完税之后，大多所剩无几，一般过着食不饱肚的生活，如遇天灾人祸，困窘更难设想，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大旱饥馑，饿殍满地，城乡荒凉，目不忍睹，老年人常有“说起壬寅年，两眼泪不干”之叹。民国二十六年(1937)大旱歉收，饥民有吃树皮白墙泥者，求雨饥民于三月二十八日冒着生命危险，结队冲入专员公署，愤怒申讨贪官污吏，拉倒旗杆、捣毁砖墙，痛打专员罗玺。市镇人民生活用粮亦得之不易，各户自向市场私商购买，而经营粮油的工商大户、凭仗手中雄厚的资金控制市场价格，加之国民政府滥发钞票，造成通货恶性膨胀，粮价一日数变，“米珠薪桂”，贫苦人民难以度日。

1950年县人民政府建立，粮食、贸易部门立即开展粮食管理经营工作，大购大销，平抑粮价，安定人民生活，经过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生产逐步发展，粮食产量直线上升，但城乡人口发展很快，国家建设更需粮食，粮食供求矛盾便日益突出，故于1953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农民除交纳公粮外，按规定标准留足口粮、种子、饲料，国家统购其剩余粮食。对市镇人口和农村缺粮户实行平价统销，迅速改变了粮食供求紧张形势，继而实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市镇统销由凭证购买到定量供应，保证了人人有饭吃，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

但在1959—1961年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措施上的失误，加之自然灾害，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58年粮食总产为51529万斤，人平653斤，1961年粮食总产30093万斤，人平417斤)，农村社员留粮和城镇居民定量供应均减少，国家库存空虚，形成购销紧张。

1962年9月中央颁布《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六十条，1963年11月《关于粮食工作的指示》下达，立即贯彻稳定农民负担，生产队对社员粮食分配采取基本口粮和劳动工分粮相结合，实施少购少销方针。对于调动粮农积极性，保证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起了重大作用。从1965年起，进而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三年”和超产、超购、超奖的办法，恢复集市贸易，开展议购议销，粮食购销状况更加好转。从1966年6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虽然粮食产量徘徊不前，农民千方百计，克服肥料农药奇缺困难，努力生产，完成粮食征购任务，才基本保证了城镇粮食供应。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惠民政策，对粮食购销作了重大调整，首先减轻农民负担，确定征购基数，不购过头粮，让农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同时放宽搞活，逐步缩小统购范围，1979年夏粮上市起，统购价格提高20%，超购部份在这个基础上再加50%，而销售价格一律不动，实行粮油购销价格倒挂，生产与消费者都得到实惠。同时扩大粮食集市贸易，开展议购议销，疏畅粮食流通渠道，城乡经济进一步活跃。对便利群众生活，促进生产和建设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1981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生产迅猛增长，1982年粮食总产突破9亿大

关，1984年总产接近10亿斤，人平口粮达734斤，从八月一日起，粮食收购实行“倒三七”比例计价（70%按原超购价，30%按原统购价），农民都增加了收入。随着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粮食消费量相应地增大，要求吃细吃精的越多，饲料和城市副食用粮也迅速上升，为适应这种新的变化，粮食工作必须搞好经营、转轨变型，遂由封闭式的分配管理型向开放式的经营服务型转变。各区粮油管理站改为粮油食品站。食品经营范围逐步扩大，质量逐步提高，1984年生产经营粮油食品30余种，销售量达1340万斤，全县粮油生产、分配、流通、经营、消费都起了新的变化；它标志着遂宁县113万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大提高。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七日

遂宁县成立最早的供销合作社

——拦江供销社

拦江 喻玄华

拦江区（现为拦江办事处），位于遂宁市西，距城七十五公里，属遂（宁）、乐（至）蓬（溪）三县区边远地区。建国前，拦江属遂宁县的第三区，先为拦江镇，后分为拦江、广福、崇胜三个乡，共辖六十五个保，五百八十六个甲，八千零八户，四万四千一百五十二人。当时农民普遍男耕女织，窄布业发达，其布质地坚实，远销灌县马尔康一带。并有盐灶房八十多家，年产食盐一百五十多万斤。加以地处三县边境，只有一个集镇，市场比较繁荣。安岳的大米、黄豆，潼南、合川的油枯，遂宁县城的药材和针棉织品等，都以此为集散地，销往附近各处。拦江场镇的工商户多达五百余家。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国民政府也搞合作社，拦江三个乡用逐户摊派办法成立了棉花生产合作社，入股二千八百三十七人，股金法币三百万元。广福乡还成立了包括供销，生产，信用的综合合作社。但这些合作社的实权都掌握在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的手里。他们利用合作社的名义，巧立名目，向政府索取补助或低息贷款，囤集居奇，中饱私囊。根本没有起到孙中山先生所说的：“盖合作事业之远大目标就是要从团结民众，训练民众，富裕民众做起，为实现团结民族，训练民权、发展民生的三民主义之第一步”的作用。随着法币不断贬值，“合作社”垮了，入股农户不但未得红利，股本也没收回一文。

建国后，拦江成立遂宁县第七区人民政府，下设拦江、广福（现名凉风）、莲花、柏林、新生（现名马河）、新民（现名水井）、宝石七个乡。一九五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全区人民欢天喜地庆祝拦江区土地改革工作胜利结束。几千年被奴役的农民有了土地，从此翻身作主人，生产热情空前高涨，买耕牛、添农具，市场供不应求。农民不仅政治社会地位提高，生活普遍有所改善，对生活日用品需求也日渐增加。而原有工商户多数小商，手工业者土改时纷纷回乡分田分土，土改后仅有一百七十户了。这与广大人民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需求很不适应。人民政府区长李拴堂同志，南下前在老解放区任过合作化干部，有办社经

验，遂根据县人民政府批准，发动各乡农民，自愿投资入股。于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召开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六月二十九日正式成立了遂宁县拦江区供销合作社。也是全县建立最早的一个供销合作社。

刚建社时，入股一千零四十一户，每股三元，集股金三千一百二十一元，选调三名原乡长、副乡长为正副主任。吴定祥任主任，利用两通面积不到两百平方米的公房做门面，开设布匹百货和油盐副食两个门市部，就这样起家营业。待群众真正看清办社的好处后，一九五二年再次发动农民、机关干部、学校教职工入股。这时已扩展到一万九千五百三十三股。

（有一人入数股的），股金达五万六千七百八十二元。股金增加，业务随之扩大，增设了生产资料店、药材铺、锅碗日杂铺，办起了木器加工、铁器加工，杀猪卖肉，加工机器巧，卖米等业务，并代花纱布公司收购棉花土布。区社还在六个乡设立服务点，就近收购农副产品，供应生产生活资料，以方便社员，服务生产。县政府批准区供销社升格为相似区级的集体经济组织，选调区政府副区长作社主任，原主任为副主任。加强管理、扩大业务、使供销社逐步走上正轨，最初营业，只凭社员证对入股社员做生意，不久就扩大到与非社员交易，但对入股社员的购销，均实行高于或低于市价百分之二到五的优惠，以后又取消了优惠价，实行按股分红。国家为了扶持供销社的发展，除了在税收、价格、运费、利息等方面给予优待外，在经营业务上，对大宗农村产品和带推广性销售的农药改良农具等均实行国家委托进行代购代销，资金由国家拨给，或者使用国家贷款，由国家有关部门支付利息，这样，解决了资金的困难，大大地促进了供销社的发展。一九五五年再次扩股二万五千三百六十八股，集资七万三千七百五十三元。为了加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决定供销社要起国营经济的助手作用，不但要负起农副产品产品的收购，还要担负对私改造的任务。从此，供销社的性质，由单一的劳动群众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发展到同时兼负国营商业职能的经济部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了对私改造任务。场镇私营工商业，分别进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组织。

一九五七年中共拦江区供销社党支部成立，职工发展到七十六人。拥有：一室（行政办公室），四股（秘书、人事、财会、市管），三员（组检、物价、统计），六店（棉布、百货、日杂用品、生产资料、主付食品、文化用品），三站（废品收购、中药材收购、农村土产品收购）。年购进额五十万元，销售额百万元，利润五万元以上，在全区流通领域内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五十年代，职工艰苦创业的精神是非常感人的，当时人少任务重，一人担数职，白天站柜台，晚上守店铺、睡柜台、睡门板，实行拨货计价，杀猪投帐，当天的帐当天清，每晚清帐清货要搞到十一、二点钟才睡，第二天一早又要开门营业或送货下乡，干部职工每人一根扁担一挑箩筐，逢场天在街上守店摆摊，闲天挑货下乡，走村串院，服务上门，每人去一挑油盐日杂用品，回一担废旧物资，重六七十斤，往来二三十华里，早出晚归，无论严寒酷暑，全无怨言，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后，经常约时定点，十数名职工一道，将生产，生活资料挑往农业社开物资展销会，以院坝作市场，以田坎当柜台，把物资送到群众手里。为了不误农时，常常晚上照起煤汽灯开展销会，职工把顾客当成主人，群众把职工当成亲人，真是鱼水交融。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全区成立一个人民公社，实行工、农、兵、学、商五统一体，拦江供销社改为拦江人民公社供销部，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由于“穷过渡”

公社无偿平调农民资金劳力，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从农业生产到商业购销，都因“瞎指挥”“浮夸风”造成严重损失。一九五九年，才将人民公社改为分乡成立人民公社，改公社核算为大队、生产队两级核算，改公社供销社为拦江区供销合作社（恢复原名）一九六二年中央再次纠正“左”的偏差，农业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供销社业务也逐渐有所增长，但在“文革”十年内乱中，由于许多工厂长期停工，生产资料奇缺，农村又大砍“资本主义尾巴”，单一追求粮食生产，经济作物和家庭副业受到限制，供销社收购的农副产品大减，销售额也降低，利润逐年减少。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国家和人民有了希望，拦江供销社也蒸蒸日上。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实行了全国性的“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一九八二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每年颁发的一号文件精神在农村贯彻执行，农村经济进行了第二步改革，整个经济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与日俱增，物资丰富，市场繁荣，购买力年年上升，拦江供销社也年年购销两旺，发展很快。到一九八五年止共集七万八千七百多股，股金二十七万四千多元，已有职工一百七十六人，下属六个乡供销分社，八个店，一厂，两室，有各种门市部四十五个，代购代销店七十六个，投资修建房屋一万九千一百九十平方米，造价八十九万九千多元，自有资金一百五十五万七千多元。

拦江区供销社成立三十五年来，始终坚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宗旨，千方百计当好农业生产的后勤。保证农民每年对化肥、农药、农械、竹木农具等生产资料的供应，不怕赔本贴钱。长期饲养种公牛两条，七十年代使全区由缺牛变为有余牛向外地出售。供销社常年派出职工二十多人，并雇佣棉花水果等技术员十多人深入社队，调查研究，帮助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落实规划，引进良种良苗，推广科学技术，扶持生产投入资金，收购产品，做好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工作。拦江棉花解放前亩产二十多斤，解放后逐年增产，一九八五年平均亩产高达一百八十斤，解放前年产柑桔一万余斤，解放后，产量逐年增加，一九八五年产柑桔一百零四万斤。竹编质量也全县闻名。这些都是同供销社的工作分不开的。从五一年建社起到一九八五年止，据不完全统计，供应了化肥六百二十五万多吨，农药二百二十九万多斤，农械九千七百一十七部，农具六十三万多件，农业加工机具二千一百七十四部，塑膜十四万多斤，支出生产扶持资金十五万元，农村土产品购进额五千七百六十多万元，为全区农业高产稳产和多种经营的迅速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拦江供销社始终坚持做好农村市场供应工作，逐年增站添店，扩大网点，尽量方便群众，增加花色品种，尽量满足群众的需要，商品花色品种由五二年的二百五十多个增加到现在的四千二百多个。还不断教育职工，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使顾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去。从建社到八五年销售总额达一亿三千二百二十六万多元，为满足全区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尽了极大的努力。

拦江供销社建社以来，始终坚持节约办企业的原则，经常对职工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改善经营管理、加强财务核算、堵塞漏洞，开辟财源，开展勤俭节约活动，因此利润增加，从建社到八五年实现利润二百九十三万多元，社员股金分红一十八万六千多元，上缴税收一百三十多万元，职工生活福利也相应得到改善，三十五年来为壮大供销社本身的集体经济和为国家提供“四化”建设资金做出了贡献。

目前正按党中央、国务院（八六）一号文件精神，加速企业改革步伐，加强组织上的群

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为农村经济改革将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遂宁华美油行见闻

城关 李国梁

遂宁县华美油行于民国十年（1921），开设在遂宁县东外正兴街（现在的海椒街干杂总店及机面店门市部），门面富丽堂皇，宽敞壮观，后面还有足可储存的大量货物的小院。

该行经理刘茂林，遂宁横山乡人。原经营干杂业务，后见煤油（当时叫洋油），汽油是外国舶来品，畅销于各县，实为有利可图之适销对路产品，在以桐油加灯草点灯照明的时代，洋油作照明用油，配以玻璃灯罩的“美孚灯”，更加光亮。其价虽高一点，但一般商贾富户因其既时髦且适用，还是很需要的。汽油更是机动运输不可少的燃料，由于他看准了势头，便专程去重庆与美商美孚公司接头，自愿担任该公司在遂宁零售批发洋油汽油的全部业务。美孚公司正欲在四川中部增设销售据点，即与刘签订合同。

刘茂林经商多年，颇会经营，又有其子刘振之为之奔走，上下齐手，四方联络，又开设美轮美奂二支行。布置精致的大东旅馆，招来四方客旅，油行生意更加兴旺。刘虽然初次投身于洋行生涯，但他对人态度和蔼，能言善交，遂宁城乡贩卖洋油汽油之小商多数，都来该行进货，他还派人四出联络，向中坝、三台、射洪、安岳、蓬溪、潼南、乐至、盐亭等县批发销售，因此他的营业比当时的“德士古油所”、“亚细亚油行”都好。

为了便利用户，扩大销路，他还全部包销了美孚公司的照明用具，使其配套，如最畅销的美孚灯，为红色白铁皮底座的盛油盒，内装扁形火口，加上扁形灯芯，外加玻璃灯罩，照明光亮，小巧灵便。还有用于夜间行路，不怕风雨的马灯。还有一种挂在厅堂或办公室的吊灯（又称保险灯、荷叶灯）、灯罩为下大上小的圆柱形，上盖一乳白玻璃圆盘外罩，形如荷叶倒盖，照起来光灿夺目，满室通明，比美孚灯、风雨灯都光亮多了。不久，又运来大批既省油，又省钱的省油灯，人见其轻便而美观，城乡争购，人咸称便。

解放初，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致使该行倒闭。随着祖国建设的发展，中国人用洋油的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而该行当时一些经营方法，而今从事商业工作的人们仍可借鉴。

大安小学简史

三家 田昉若

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后的第六年，大安（当时名卢家场）一般私塾老师只教蒙童识字，得极薄薪资以糊口。只有个别富贵人家，才专门延师教其子弟，而立学有成者几希矣。加之民国期间，外出作官、任教或从事其他职业，除了首先要金钱开路，要人说情之外，还很重视资格（即××学堂毕业）。只懂“子曰：学而时习之”的青年又无法考入初、高中，更不要说上大学了。当地部份富绅和社会贤达，首倡创办新学堂。既能满足富绅子弟上进的愿望，新学只缴书本费不收学费，亦适合穷困农民送子识字的要求。这样，第一个国立初级小学应运而生了。最先是下场柴市坝卢氏祠，由卢氏宗族会产，自费办了一所初级小学，聘舒含辉任教，而行课并不完整，复由上场陈、石、夏、邓几族倡议，在现学校河对岸，租建三间草房，请落第秀才邓茗清、翁仲豪任教，仍教部份古书，兼读一些白语文，如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文言对照的作文范例，注解名人尺牍，和添一部珠算，一九一九年陈益峰在遂宁劝学会任职，其孙陈达章在中学毕业以后，以优异的成绩，出任遂宁第一小学校长，春节公孙返里，商得本乡热心新学人士的赞助，遂决定创建学堂，得邓姓无偿捐赠地基一幅，建造一颗印的瓦房大四合院作校舍；经费半请官助，半则提文武二庙的庙座，建成后经县官批准定名为“遂宁县第四小学”。由邓茗清、邓秉乾（秀才）并聘请出外教学的本地教师李照南、王灵仙回籍共同任教。开两级四班，只收男生，不收女生，共不足一百人，教学成效虽不显著，但亦总算是按照部颁课程施教。一九三一年夏从本乡的斗口牙行、屠场税收中提取部份资金建修一座女生院，招收女生，由李须哉（秀才）、陈希古住校作专任教员，闲杂人员不准入院。至此才形成正规的完全小学。当时要打钟上课，早晚学唱军歌。后来出了四名由本乡启蒙而后得出国留学的学生（陈英久、郑伯英、杨拔尤、夏士奇）一时名声大振，乡人为之眼红，大家始觉得读新学才有出路，遂纷纷送子女到校。私塾日趋衰落。

建校后初小有语文、算数、常识三科，高小开语文、算数、历史、地理、自然、公民六科，其余（音、体、劳、美）科多不大受人重视，排列课时，一般都几乎是作调剂课处理，因此音乐、体育、美术等科长期鲜见成效。

当时教师工作没有保障，是由校长聘任，只报请县教育局备案，每到农历六月、腊月学期结束，教师必有一番大的动荡，好的教师争相聘用，素质差的教师如传皮球似的，你传给我，我传给他。工作久不落实，所以就必须通过一些不正常渠道，拉关系、求人情，行贿赂，相互争夺，被称为“六腊战争”。

社会上名义上好像很尊重教师，而实际呢？教师究竟有什么实惠？国民政府根本就不关心，工作得失，自行谋求，病医死埋不闻不问，如教师王凤鸣，教了一辈子书，老年眼睛教瞎了，辨不清字迹，只好回家打草鞋，黎楚南年逾六旬，为人个性刚直，不愿攀结权贵，中途解聘了回家画单条卖对子，青年教师王心正一气之下峨眉山当了和尚。

一九四〇年张理杨任校长，把街上女生部撤毁，搬迁到校本部改建，虽是蹉脚蹉手不成大事，然亦达到了男女合校，减去了教师往返于两部之间的麻烦。抗日胜利，学生人数增多，校舍不能容纳，石明威作乡长时，会商有关人士，决定扩建校舍，然而县上根本不关心教育事业，拒不批款。经费必须自行设法，于是自动组成了建校委员会，抬出了一张王牌，请了当时有威望的绅士夏辅仁任主任委员，乡长校长任副主任委员。经费主要来源是：当时任大安仓库主任杨仲安，把所有仓存军粮用高利贷出，获谷四百多石，建委会对他傍敲侧击，名为动员实为责令他交出黄谷三百多石，作为扩建学校之用。杨慑于群威，不敢不服，这笔经费虽属高利盘剥，然能从虎口夺食，不让其一人中饱私囊，置于正当用途上，亦属幸事！后将此款一部份修成了学校较好的四间教室。

以后郑作孚、邓秉乾、王伯居相继任校长直到解放。解放后改名大安小学。特别是土地改革以后，翻身农民之子女纷纷要求入学，人数倍增，党和政府热情支持，乃将街上武庙文昌宫改建成学校分部，能新开八个班，满足了农民子女入学愿望。

天主教传入遂宁的前前后后

南 强 刘伯常

天主教是伴随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闯进中国来的洋教。传入遂宁后，经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我所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

一、晚清时期

早在清朝光绪初年，法国传教士在成都创立天主教堂，影响逐渐扩及遂宁。先是安岳天主教徒黄铁匠来遂宁出卖铁货，劝说县人席宗权入教。积年累月，辗转串连，教徒日渐增多。但本县斯时尚无神甫，暂归安岳神甫代“牧”。时间约在一八七四至一九〇三年。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成都始派神甫来遂，先后计有：哈、沙、博、冯、文、毕六个法籍神甫；继有中国神甫孙润云、阎安当、伍××和董怀安等任遂宁教堂司铎。一九二六年，南充设立中国教区，即将遂宁天主教划归南充主教王文成管辖，董怀安原任未动。南充教区修建教堂，我县教会人士曾予资助。董怀安离任后的一段时间，有王德华、钟炳亮、李益云、常逸天、黄海若、黄渥泽几位，历时八十载，加上开始由安岳代管的二十九年、计为一百〇九年（至一九八三年止）。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一些外国神甫，在中国横行无阻，清政府的官员都怕他们。例如法国神甫（文爷）为替教徒向县官打官司，坐上青纱大桥，冲进衙门说情，县官未即作答，文竟揍县官一烟杆。此后各届神甫，也都坐起大桥，与县太爷分庭抗礼。一些地方官吏和社会人士竟称神甫为“司铎大人”，教徒称神甫为“灵魂父母”或主爷，幼儿少年称神甫为祖祖。教徒晋谒神甫，一定下跪磕头，不分室内外均一样。教徒对教堂管事，亦称老爷。

神甫下乡看教友，由当地教徒去抬大桥，担衣箱，神甫到哪家，由东道教徒办上美酒佳肴，糕点糖果，由神甫带去的厨师主办。就餐时，刀刀叉叉浙滴哗啦。神甫昂居首位，众教徒侍立两旁，无权入座。

积习相沿，一般教徒都认为神甫代“天主位”是神化了的人。而神甫则不免玩弄神权，顺之者赦罪，逆之者降罚。神权威严，无以复加。

二、民国时期

辛亥革命后，在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高潮冲击下，无论外国、本国的神职人员，作风都逐渐有所改变，仿佛也知道顺应潮流。过去城内大经堂门首高悬的法国旗帜自行收藏了起来，各乡经堂房顶上铺的法国旗，也揭了下来，昔日在桅杆上挂着法国旗帜的大船（教徒王笃生等）也消声匿迹了。最令人难忘的是，大经堂门首高悬的“大法国天主教”吊牌，也改成“中国天主教”字样。往日天主堂对县级机关行文用公函，继后也改用呈文了。

为了大量发展教徒，不但推行一人入教全家老少都得入教，还规定教徒不能与非教徒结婚，非教徒不论男女欲与教徒婚配，均须入教方可结为伴侣。生下婴儿，即领婴孩洗礼，小孩上了五岁，即送“经言堂”教读经书，学念圣经，望弥撒……

凡诸信辈每日早午晚要诵玫瑰经，瞻礼六忌食猪肉，主日停止劳动，专门诵经或讲经等。

每年有四大瞻礼（耶稣复活、圣母升天、圣神降临、耶稣圣诞）特别是“圣诞节”城乡远近教徒，男男女女，都赶至城内大经堂，办告解、望弥撒、领圣体、诵经唱歌，举行热烈庆典。

教徒死亡，由众教徒前往诵亡者经，立“十字架”于墓前。每届诸圣瞻礼，办“追思已亡会”给已亡教徒义务诵经。

遂宁天主堂在顺城街设有“保婴堂”，免费送驱蛔虫药；经堂内设“育婴堂”（后改慈幼院）收养被遗弃的女婴、由修道抚育管教，成年后，由教会安排成家。李益云，常逸天神甫曾于北门外小经堂办兴华小学，因未准立案停办。一九四五年，黄海若神甫采纳会长刘伯常、教徒吴伯皋专人建议，经王主教允许，创办“私立仁爱中学”，黄海若、刘伯常、吴伯皋后增张克谦等任董事，王文成任董事长。黄海若代董事长兼校长。办学经费，大部分靠教产收入，一部分由教区拨给，一部分由本县教徒捐助。

法国神甫在遂宁南门外下码头创建第一座天主教堂，不久即迁至三清街水井巷。一九〇五年，冯神甫在城内顺城街修建较为宏壮的教堂。一九一九年，毕神甫在北门外修建暑楼。一九一七年，成都教区拨给南充教区林神甫作开办费用的一笔巨款先后在遂宁境内南北坝、思娘滩、风台坝、银子岩、过军渡、倒座庙、高谷井、桅杆坪等地买得地五百四十四亩，水田五百七十六亩，合计一千一百二十亩，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并借此要求承租人全

家(包括尚未成年的不能自主的少年儿童)入教,否则解除租约。还在本城购置八间街房,只租给教徒居住。于是,导致城乡教徒迅猛发展,各乡达一千余名,本城亦达二百多名。教堂设董事经收地租房租。

三、解放后

解放以后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的一贯政策。建国初期,罗马教徒对我们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遭受到爱国的中国神职人员和教徒们的不满和抵制,遂宁天主教神甫黄渥泽响应由广元神甫教徒发表的《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遵守党和政府政策,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后,神甫黄渥泽,老会长颜志远被邀参加县政协作委员。组织教徒开展正常的宗教生活。

教会学校,解放后由于教区不再下拨经费,教会封建土地剥削受到抑制,办学经费无从筹集,遂由会长兼代理校长刘伯常征得各董事同意后,申请人民政府接办。改名为遂宁县第二初级中学,现名城北中学已升格为高完中。

文革期间,天主教和其他宗教一样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冲击,教堂被占用,宗教活动停止了。

三中全会后,进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落实了党的宗教信仰政策,县委统战部、县人民政府督促各单位清退了所占天主教堂的房屋和其他物资,立即退还,有困难的,补办了租佃手续,使信教群众又过上了正常的宗教生活。并选送青年教徒进神哲学院受业,培养神甫的接班人。

从黑暗走向光明(连载)

永济 赵洪轩

四、立足豫北 连战皆败 (一)

1947年4月,在浚县城外打了一仗之后,122旅收缩在浚县城里,闭门不出,连日来,解放军也没有围城叫战,到也相安。实际上浚县已是一座孤城了。

366团教我这个营伤亡较大,使我的心情沉重难安。作为一个最前线的指挥官,在战斗时唯恐部下不卖命而声色俱厉。战斗结束,又悔恨自己无能,没有使部下的伤亡减少到最低限度。这种矛盾心理,更加突出了,几乎无法控制。得到阵亡的已经掩埋好了,伤兵已送走的报告后,才情绪稍安。

团部临时指定连排长代理人,把携带的弹药,发给我营补充。枪还是要自己带起走。各连排不愿让那么多人带双枪,也无可奈何。

官兵喘息方定,又听说浚县再次被围,122旅奉命往援,弃浚县城而走。张宣武旅长率领直属及364团在前,366团殿后,赶到滑县旅长已经走远了,留下一位参谋传达绥靖区的命令,指定366团,固守滑县城。陈择善接到任务,吓得魂不附体,几乎堕马。进得城去一看,已

是人仰马翻，县政府烧毁公物文件，焦臭难闻，烂杆子保安队和警察，押着一群蓬头垢面带起镣铐的人，正在出南门吆吆吼吼而去。县长随带几名彪形大汉，牵着马，斜插枪，立在城门洞边，等候陈团长到来。他们低语一阵，都是神色慌张，陈则冷语相送。

这帮人既去，一座县城空空如洗。我们是走是守，陈团长一无主张，喊叫营、连长拢来，大家都表示愿听吩咐，副团长蒙越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城怎么守？不如都赶去汲县，若能助威解围总司令（指孙震）或可默许。”

陈择善一听有人主张不守此孤城，正合心意，好象勇气倍增，决心弃城西去，下令集合出发。又顾虑旅长还没有走远，不许抗命弃城，强令转来就不好看了。决定改一条路线，出南门走一、二十里路，再拐弯向西到汲县外面停下，以观动静。我们力促动身。

滑县距汲县不足八十里，强行军几个钟头就可以赶到。可是，我们却象“小脚女人”，转弯磨角，走了大半天和一个整夜。一路之上，陈择善六神无主，唉声叹气，昔日威风，荡然无存。真是军令压死人！同时他又在这一带尝过解放军伏击的“辣子汤”，若中途碰上对头，被迫应战，吃败仗是注定了的，这更难以交差。在此两难的情况下，要摆脱窘境，谁也不会比陈择善高明些。一个怕字，把人折磨成这个样子。当部下的也无法分忧解愁。

我这个营，新败之余，尚待整顿补充。对于夜间行动，尤为疑虑反感。部队一停下来，官兵都往地上躺，稍久一点儿，有的就睡着了，还打鼻息。再走，就要连排长去一个一个的拉一把，低声唤醒。我命令连排长，各自掌握部队，有事不要惊慌乱跑，切忌无故鸣枪。重机枪连走在营的先头，我带部队紧紧跟在团部后面，不拉长距离，给团长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

西望一勾残月，没有什么亮光，好象在为我们夜行军打掩护。大地上死气沉沉，除了急促脚步声外，别无音响，旷野寂静非常。侧望“北斗”，我们的方位并没有走错，反观“启明”，还未露脸，夜！为什么这样漫长啊。

我们由远及近，汲县方向始终没有听见一声枪响。虽一夜耽惊，但庆幸的是尚未遭受解放军的尾追或截击。再一次停下来休息。由于疲劳与饥饿交加，官兵一坐下来就难开步了。我们还是昨晨天不亮，在浚县吃了饭的，已一天一夜水米未沾，官兵一样受罪。团营长凑在一起判断，汲县决不会失得这样快。又想“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决定还是靠拢去，免担风险，官兵也得早点休息。

“行百里者半九十”，这样的疲劳轰炸，行军也不出此。这下我们胆子也大些了，天明就可望见汲县城，可是走这二十里路，大家都很费力。

到了城外一看，旅长带的部队还在公路上露营，汲县城门紧闭。张宣武见陈择善走去，只问了一句怎么你们也来了？却不愿担一丁点责任，叫陈择善快去见司令官。这也是陈择善一贯的飞扬跋扈的后果吧。

我们自去安排官兵食宿。听说陈择善见到孙震连问几个你是怎么来的？滑县呢？还没说滑县已经丢失，孙震就大发雷霆，骂陈择善混蛋！混蛋！我要办你这没用的东西！还是一些高级幕僚打圆场，叫陈择善出去休息，再去把滑县夺回来。

未见解放军的影子，就一天丢失两座县城，司令官孙震恐怕也有些担待不起，因此陈择善就做了替罪羊。

隔了一天，集合366团，孙震亲自来训话。张宣武也提前到场。孙震出来带有随员一大路，他脸色铁青，张宣武上前敬礼，孙震看也不看一眼，使张非常尴尬。陈择善更是雷轰头

顶，满面汗流，意识到大祸将要来临。

这时全场肃立，鸦雀无声。孙震在部下面前，故示威严。他说了几句话，并没有半个字慰问下级官兵，接着宣布：

366团团长陈择善放弃城守，作战不力，撤职查办。

366团副团长蒙越撤职。

366团第一营营长田颖，调该团任团副。

366团第三营营长雷振声调41师部副官处服务。

任命：

刘景素任366团长。

苏龔生任366团副团长。

吴××任366团第一营营长。

彭行藏任366团第三营营长。

说到对陈择善查办，只不过掩耳盗铃，说了就算了。团部和一、三两个营，迎新送旧，我次次在场，打了几个饱牙祭。

不久通知下来。任张勃为我这个营副营长。

周维兴（师部参谋）任机枪连连长。

王世清升任第四连连长。

还有排长一名也同时任命，负伤的军官，原部开缺。

在休整的时候，我这个营编成三个连，派唐德明连长，带班排长，随同第三营营长彭行藏，去上蔡县接收新兵。我们没有分配任务。

这次对366团的处理，看起来是很认真的。一个团的中级官都撤换完了。可能起一些“杀鸡给鹅看”的作用。然而，对我来说，好象不关痛痒，更无所谓患得患失。谁来谁去，还不是一样，几位去职的人，不当团长、营长，未必非福。我就是这样麻木不仁。有人说我，“不会做人”。又道是：平生不带“奴才像”，任你人前说短长。

我们在汲县城外驻了几天，没有分派什么任务。我同副营长、连长一起，到城里城外看了一遍。汲县城墙是砖砌的，有一丈四、五尺高，城门洞有两道城门，进了头道门，走五十米远又是一道城门，有弧形墙，叫做月城。

第一次解放军攻城时，南门外城门被炸了两个洞，是用黑色火药包，把半截城门都烧焦了。攻势确是相当猛烈的。第二次只攻占了南门城关，两次都没有攻打进城。

城东南角有一座十一级的又高又大的白塔。白塔距城墙不到百米，守城部队利用白塔下层，做重机枪阵地，第二层架轻机枪，上面还有手榴弹。

东门已经关闭，北门有卫河，西门城关街道很长，南门城关也有较长的街道，为了做成据点工事，守军撤掉和毁坏很多房屋。

“没有重兵器，攻打汲县是不容易，部队有这么多，我们还是把心放在自己的兵身上，吃饱睡足，能打一次牙祭就好了”我提醒大家。

我这个营暂时只有两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一个八二炮排，武器多的还要留守。几个月来，官兵伤亡四十名左右，其余就是东一拖，西一拖，把兵拖散、拖跑、拖病、拖死，一个连就报销了。许多带兵同行，莫不为此大伤脑筋，都说自己的部队是拖垮了的。是解放军在指挥我们，叫你往东就往东，要你往西就往西。挤到一起来我们才安逸。